

第 8 卷

◎顾问
李新
廖盖隆

20世纪 中国全史

曲折探索

刘友于 陈世英 李作民
崔萍 杨火林 / 著

1956-1966

1956-1966



中国

第8卷

20世纪

全史

曲折探索

刘友于 陈世英 李作民
崔萍 杨火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曲折探索/刘友于等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中国 20 世纪全史 第 8 卷)
ISBN 7-5006-4262-8
I. 曲…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1956～1966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898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发行部电话：(010) 64010813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8.5 印张 5 插页 459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46.00 元

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64033570

《中国二十世纪全史》

顾问

李新 廖盖隆

主编

黄修荣

副主编

刘益涛

策划

胡守文

特约审稿

蔡云 林君雄 滕明道 王溪元 李萍

责任编辑

冈宁

1900-2000

目 录

第一章 独辟蹊径	(1)
一、“换了人间”	(1)
二、苏共“二十大”，“以苏为鉴”.....	(4)
三、《论十大关系》.....	(19)
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8)
五、“八大”后的继续探索.....	(51)
第二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56)
一、“风乍起”.....	(56)
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65)
三、整风运动的发动.....	(83)
四、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92)
五、反右派斗争及其后果	(101)
第三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14)
一、“大跃进”的序幕	(114)
二、“大跃进”的发动	(138)
三、“大跃进”的高潮	(151)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167)
第四章 暂时的退却	(183)
一、“压缩空气”	(183)
二、初步整顿人民公社	(194)
三、头脑要冷也要热	(202)

第五章 新的“跃进”高潮	(210)
一、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	(210)
二、“反右倾”斗争	(243)
三、国民经济再“跃进”	(253)
四、沉重的代价	(268)
第六章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初步贯彻	(275)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275)
二、农业调整的开始	(281)
三、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89)
四、《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	(303)
五、商业和城市手工业问题	(311)
六、精简城市人口	(317)
七、工业的调整	(324)
八、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331)
第七章 进一步贯彻调整方针的三次重要会议	(340)
一、七千人大会	(340)
二、西楼会议	(353)
三、五月会议	(357)
第八章 全面调整	(366)
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复苏	(366)
二、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	(370)
三、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381)
四、轮训干部和甄别平反工作的进行	(388)
五、关于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探索	(392)

目 录

第九章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400)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	(400)
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406)
三、与苏共决裂	(413)
四、中印边境战争	(421)
五、争取“中间地带”，“反帝、反修”	(426)
 第十章 反修防修运动的开展	(432)
一、中苏论战	(432)
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453)
三、国内反修与“四清”	(465)
四、石破天惊的诘问	(481)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被点燃	(495)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495)
二、有关海瑞的话题	(513)
三、两个中央文件的制定	(525)
四、“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540)
 第十二章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	(556)
一、“再用三年调整”决策的形成	(556)
二、继续调整任务的完成	(561)
三、试办托拉斯和劳动制度改革试验	(564)
四、“三五计划”的制定和三线建设的起步	(569)
五、曲折探索中的基本成就和两个发展趋向	(575)
 主要参考书目	(582)
后 记	(589)

第一章 独辟蹊径

一、“换了人间”

1956年9月2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盛会。

从中共“七大”到“八大”这短短的11年间,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极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七大”路线,使中国革命处于不断进攻和接连的辉煌胜利之中。我们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在党的“七大”以后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人类1/4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第二,在建国初期,用不到3年的时间恢复了被国民党统治和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完成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及其他社会改革任务,清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肮脏的旧基地。

第三,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被“卷入到错误的战争中去,在错误的

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认了的敌人作战”^①。

第四，从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过了4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项目到1956年完工和接近完工的达500个。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某些发电、冶金、采矿设备、金属切削机以及汽车、飞机等都能开始制造了。我国所需的机器设备的65%都已自给。我国的工业产值以每年递增19.6%的速度向前发展，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农民收入和职工工资五年平均增长了30%。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指标已有确定把握提前完成，这将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第五，本来预期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提前了。1956年在各条战线上迎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尽管过于匆忙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及偏差，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泱泱大国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中国建立起来。

第六，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1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尤其是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他们经受了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和党内斗争的考验。他们多数出身于小生产者和农民，也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在完成民主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阵地的时候，又面临着执政党地位的新考验。但是除少数人落伍、掉队外，都继续不停顿地

^① [美]约翰·斯帕尼尔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为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盼望的翻身解放事业是由他们亲手开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与“七大”相比，党的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到 1956 年“八大”召开前，全国有党员 1073 万，比“七大”增加了 8 倍，比 1949 年全国革命胜利时增加了两倍。这就是说，90% 以上党员是“七大”以后入党的，60% 以上是新中国建立后入党的新党员。这既壮大了党的力量，又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任务。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员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在领导人中容易形成独断专行的作风。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土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现象，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及高岗、饶漱石事件的揭露已向中国共产党敲起了警钟。

总之，从“七大”以来的 11 年，中国已经“换了人间”。帝国主义已被赶出中国大陆，我国已经成为伟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基本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于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国内各民族已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这一切，在中外革命历史上是少有的。11 年间，连续不断地进攻，领导占世界人口 1/4 的东方大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而不遭遇大的挫折，这是继法国 1789 年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伟绩。11 年的巨变使中国终于在世界民族之林面前高昂地抬起了头。

现在面临历史转折，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七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而且把以下的问题提到了党的面前。诸如：如何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应当而且可能达到什么样的发展速度？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形势如何？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组织等各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怎样把一个为夺取政权而长期进行战争的军事化的共产党，改造为适合于和平时期领导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民主化的党？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如何避免为传统势力和权力所腐蚀？怎样才能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成为社会公仆而不是社会的老爷？总之，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的回答，以便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

中共“八大”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冲击波更加强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

二、苏共“二十大”，“以苏为鉴”

1.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经过复杂和残酷的党内斗争镇压了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地位，领导苏联党和国家长达30年之久，形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从1927年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而埋下了祸根。

在农业上，斯大林企图用剥夺农民以积聚资金的办法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从而导致了粮食收购危机。于是在 30 年代，强制实行集体化，把广大小农都赶进集体农庄，广大农民失去了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从十月革命胜利到 1956 年的 39 年间，苏联农业的产量低于或稍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这使苏联长期面临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严峻局面，直到苏联解体后都未能改变。

在工业上，从 1929 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由于苏联的“孤岛”处境，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提出了冒进的高指标经济计划。而在开始实现五年计划的时候，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把党内维护比较稳妥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的同志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时又在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广泛开展反对所谓“沙赫特破坏分子”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

斯大林不顾经济平衡，极力推行超高速工业化的方针，采取紧急状态下的全民动员办法，在 30 年代中实现了苏联的工业化。但是由于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规律，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生产效益日益低下。战后，除军事技术外，其他方面同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对这种情况，斯大林视而不见。他在 1934 年举行的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联共(布)党的“十七大”上，宣布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已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1936 年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1938 年他又提出苏联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部苏联宪法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固定了下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至此得到定型。

由于错误的政策遭到抵制和不满，为了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

斯大林又制造了“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化”的理论，以打击反对派，并大大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关，把内务人民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专政机关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成为直接从属于斯大林个人的专政工具。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起，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在1936—1938年间，“大清洗”更达到骇人听闻的高潮，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党政干部和群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批“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图哈切夫斯基等大批在内战中功勋卓著的原红军指挥员均被判处死刑。

在文化思想战线方面，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战后，斯大林抹杀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在遗传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运动，把许多知名的学者、科学家和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唯心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人民的敌人”、“伪科学家”，等等。他通过这些大批判和大斗争把自己树立为各个学术领域的最高权威，真理的最后仲裁者。斯大林在学术问题上对不同观点采取的高压政策窒息了苏联学术思想，造成了苏联长期的思想僵化，他的形而上学影响了苏联几代人。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后就大搞个人迷信。从1929年底庆祝斯大林50寿辰开始，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苏联展开了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造神运动。从此时开始，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气氛就风靡全国，而且愈演愈烈。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斯大林的讲话成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种长期的思想灌输下，苏联人民中形成了一种把一切成就都归于斯大林，把人民的一切希望和国家的全部命运都寄托于斯大林的不正常的社会心理状态。

在对外国共产党和外国的关系上，他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如二

战前对波兰等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清洗和镇压,对南斯拉夫进行压制打击,怀疑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等等^①。

战后斯大林因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胜利而更确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性,把它凝固化为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而强行推广到所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在斯大林时代,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看,应当承认苏联的成功多于失败。因为苏联毕竟在短短的时期内成了世界超级强国之一。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苏联全部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1倍多,跃居欧洲第一。这种发展速度在当时世界上是仅有的。把工业产值增加20倍,美、法、英等国曾花了80年到100年时间。正因为如此,苏联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击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苏联红军威震世界。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角度看,必须承认苏联的失败。首先它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关于“物的解放”的目标,未能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其经济体制从总体上窒息了国民经济的活力,最终导致经济的停滞与萎缩。其次它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目标,未能给人民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所应有的民主、自由、文明条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践踏,社会经常弥漫着恐怖的气氛。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名称是完全不相称的。总之,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了严重的恶果和沉重的遗产。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的病态及一系列严重问题一下子突出出来。苏联历史的发展要求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导人全面、准确地总结斯大林时代的经验教训,纠正斯大林为苏联社会主义作出的错误历史定位和模式,治疗巨大的历史创伤,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化。遗憾的是,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能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赫

^① 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鲁晓夫上台后，苏共领导人以平反冤假错案为突破口，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如对轻工业的加强和对农业体制的改革；围绕以重工业为重心方针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改变；为一些少数民族恢复名誉。这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作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2. 苏共“二十大”——对外思和，对内思变

正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准备中共“八大”，召开国务院 34 个部委汇报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以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1956 年 2 月 14 日，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全世界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应邀出席，中国代表团由朱德率领。大会面对战后的形势和苏联国内情况，提出一系列新的国际国内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首先，大会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冷战”态势，以及维护和平因素的增长，认为在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下，国际紧张局势多年来第一次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从而否定了斯大林提出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得出了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由此，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理论。对“和平过渡”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提出，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而且有利于改善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形象，对于鼓舞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斗争有积极意义。

其次，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滥用职权、独断专行、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以及欣赏、纵容并制造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这在全球形成巨大的冲击波，造成了正负面共存的效应。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秘密报告》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出现了像波兹南事件，特别

是以后的匈牙利的政治动乱,一度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困难境地,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另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上、唯书”的局面,引发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长时间内,人们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道路和形式。赫鲁晓夫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用特有的材料作出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暴露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各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自此得以分析思考批判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许多现象和观念,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使人们的思想从苏联社会主义统一模式论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

苏共“二十大”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陶里亚蒂指出:“苏联的模型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必须遵循的模型了”^①,他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思想。哥穆尔卡也认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的条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②。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在此后发生过重大挫折,但根据本国情况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念,自此开始植根于各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

再次,制定了急于求成的赶超战略——“六五计划”。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仅没有总结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教训,而且把它推向极端。他在报告中用比喻说明苏联所处的阶段:“我们已经

① 《陶里亚蒂言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90 页。

②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 页。

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的远景。”^①

苏共“二十大”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析后，提出苏联人民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解决苏联基本的经济任务——在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苏共领导人还根据报告中列举的数据推算，在最近的26年（1930—1955）中，苏、美、英、法工业产量平均每年增加的速度分别是12.3%、3.3%、2.4%、0.9%，其中在没有战争的20年间，其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8%、2.8%、3.5%、2.5%。也就是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5—7倍和7倍以上。因此，上述任务是能在历史上最短的时期内解决的^②。

苏共“二十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六五计划的指标，规定了六五计划中，工业产量在五年内增长65%左右，生产资料的生产要增长70%左右，急速扩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至于人民的生活水平，工人的实际工资将增长30%，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将增长40%，住宅增加一倍。

上述生产指标意味着，在今后5年里，苏联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比美国和英国在整个战后时期（1946—1955年）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一倍多。而战后时期是两国生产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讨论六五计划过程中，苏共领导人乐观地说：“六五计划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和详尽的旨在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③

六五计划急于过渡的思想遭到苏联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为

①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6期，第38页。

② 苏共“二十大”上谢皮洛夫的发言，《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8期，第96页。

③ 苏共“二十大”上米高扬的发言，《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8期，第111页。